

〔西班牙〕拉 斐 著
傅石球 译

风云 突变 的时代

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复旦大学出版社



风云 突变 的时代

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西班牙〕拉 斐 著 傅石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突变的时代: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西班牙〕拉斐著;傅石球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309-05214-5

I. 风… II. ①拉…②傅… III. 俄罗斯-现代史-史料
IV. K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279 号

风云突变的时代——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西班牙〕拉 斐 著 傅石球 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林骧华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48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309-05214-5/D · 316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俄罗斯之比较

(代中文版序)

拉 斐*

中国与俄罗斯被其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联系在一起。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在这里我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100年乃至150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20年至30年间所进行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那么这又是些什么内容呢?我想也不外乎以下几点:

在21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到了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度消亡或解体了。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给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各位一定都能了解我所指何来,在此我也不愿浪费笔墨。但大家必须了解的一点是,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已将近3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16年中,政府计划(一般而言,在中国,政府计划的目标总是能达到的)预计会有3亿至4亿的农

* 作者拉斐(Rafael Poch-de-Feliu)先生曾在苏联、俄罗斯任常驻记者14年。现在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主要日报《先锋报》(La Vanguardia)驻中国记者。

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3.5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其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直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应。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导线,将中国的四大优势贯穿在一起。它们表现在:

首先是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这是什么意思呢?“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特定的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其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1917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明显是过于严酷的。斯大林去世后,这一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就如同历史学家穆希·卢温(Moshe Lewin)所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在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子,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的。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okratia”的重构,这是一种向所有权聚集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一种同其基本内涵的转变相符的、同爱国的目的相符的、同传统、保守的形势相符的选择,就像中国一样。尤里·安德罗波夫可能是丧失了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而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的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一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

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1945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具有最先进的教育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会最终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存。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地无力。这并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就俄罗斯早在1917年之前就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言的: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更何谈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后工业时期”发展的有效模型。而现在俄罗斯社会对于过去的态度,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士气低落,任其滑入一个“为国家的衰落而痛苦与悲伤”的境地。而将这段历史描述成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一种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让我们讨论中国的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如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

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19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力。他们丧失这种权力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妇女是不能具有投票权的,直到1905年,妇女们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力。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20世纪的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在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民主往往成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另外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治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总统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就是反对腐败。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出现在监狱的铁窗之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情况在俄罗斯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它的管理,将一个“好政府”的烙印打下。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能够提升人才的机制,它可以把人才提升到政府以及党内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决策

体系,这一体系集合了集体的智慧,能很好地听取建议。

中国的领导人经常举办学习会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要参加。这种会议一般是以听取各种专题报告为主(比如说“法治政府”,腐败,同俄罗斯的外交以及经济战略等等)。来自于中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他们的论文以及报告,领导人提问,记录,得出结论,从而制订出高品质的政策。

上述情况在俄罗斯都不存在,比如说,在1992年,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就已经相当精准地预测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却没人予以注意。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同中国相比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停滞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于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500强——它们是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58家(12%)来自亚洲,其中46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其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o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名字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合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需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不像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副空架子。

中国的领导人宣布要将人均 GDP 从现在的 1 000 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 000 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权力的垄断),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中国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的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吸取得越多,他们在发展中面临的危险就越小。

北京 2005 年秋

目 录

中国、俄罗斯之比较(代中文版序)	1
风云突变的时代	1
1 从前的苏联	1
2 自由的代价	35
3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切尔诺贝利	56
4 “开放”的意外礼物	74
5 分裂的开始:叶利钦奇观	95
6 乐观的欧洲秩序的崩溃	117
7 权力的真空和各式各样的危机	147
8 民族的觉醒	156
9 转移	192
10 实行总统制、“推土机政策”和联邦制	205
11 1991 年的 8 月	227
12 领导空缺期和结局	262
13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274



西方和俄罗斯 358

尾声：疑惑和问题 380

风云突变的时代

1 从前的苏联

60年代：在时代的交汇点上

苏维埃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了顶点。这是一个抱有明智的希望和正当的社会乐观态度的时代。苏联人民在过去的30年期间从来也没有生活得这么好。城市居民的人数第一次超过全国居民总数的一半(1965年达53%)。按照国家的集约建设住房规划的目的和任务,确保有集中供应水、电、煤气和暖气的独户住宅开始取代窄小的公房住宅和斗室;家里出现了收音机、电视机、冰箱。

当时还出现了医疗和社会保险服务(例如发放退休金)部门。工资增长明显,其中包括农村地区,那儿已废除禁止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庄的规定。社会能克服卫国战争的惨重后果,这场战争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人口危机——死了千百万苏联公民。国家从废墟中挺立了起来,苏联的欧洲地区的城市 and 地面设施得到了重建。斯大林去世(1953年)后,在1954—1957年期间,劳改营关闭了。

钢产量在1945年是1230万吨,在1960年增长到了6530万吨,发电量从4320万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9200万千瓦/小时,汽车产量从74000辆增长到了542000辆。如果说5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0%的话,那么1953—1964年期间的工业生产量就增长了3倍。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同西

方的“差距”都在缩小,开始看得见有可能形成战略平衡的前景,至少在火箭武器方面是如此。苏联在世界上首先把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去,并把宇航员送去遨游太空。三分之一的地球居民在那个时期都生活在苏维埃制度所鼓励的体制下。

非殖民地化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使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新生的力量——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情况不可能不引起苏联对它们的注意。在加勒比海区域(一个最出乎意外的地方)发生了给人以希望的古巴革命,照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说法,它使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参加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经历过埋葬他们心中希望的主要“掘墓人”斯大林的时代的少数大人物“恢复了青春感觉”。作为一个正在实现迅速的现代化的、具有相当大的军事潜力的和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苏联的国际威信继续在增长。这就产生了大乐观和大期望。赫鲁晓夫允诺要“赶超西方”。

“先生们,你们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吗?”在1961年4月,在加加林飞入太空后的第二天,《真理报》问道。“那就看看天空吧,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劳动争得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天地,苏维埃人离开了地球的疆域。这一简单的句子像一个数学公式似地对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历史、强大的自然力的利用和人类的自身发展进行着总结。”在同一年的7月,苏联共产党通过了一个充满同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的新党纲。“党把共产主义建设视为一项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主义任务。”党纲里有一个更加断然的论点:“现在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赫鲁晓夫甚至确定了履行诺言的期限——1980年。为了最美好的未来,国家生存、斗争和受苦受难了将近40年。现在这一未来是以现在时体现出来的:“现在这一代!”诗人叶甫盖尼·多尔马托夫斯基问道:

伟大的纲领,请回答,

20年后我们将会怎么样?

官方意见和现实生活之间当然是有差别的;可是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这类声明听起来是相当庄重的。实际上,这也被列

入苏联共产党通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与人都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苏联正在创建一种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的观念，这个国家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为工人和农民（实际上就是全体居民）创造了最好的生活条件，同样也在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创造更优惠的条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则在国外出版了《日瓦戈医生》（1957），赫鲁晓夫夸耀地建议他试着离开苏联去亲身体验一下资本主义乐园的所有乐趣。

苏联社会，至少是它的极大一部分，也像它的领袖们一样相信固定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并不是社会主义学说的欧洲前辈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是民族的意识文化的派生物，是在近几十年的紧张和矛盾的大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在这些价值观、社会的同心同德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的基础上，本可以实施一些会使苏联公民的生活得以正常化和有所改善的深入改革，渐渐克服现存制度的专制性，解开斯大林所造成的那团官僚主义症结，并在新危机的威胁降临之前把国家带领到更加有利的地位上去。

这幅田园画的背面是官僚制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部缺陷和毛病的总和，以及加快了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和计划。缺陷和歪斜导致这一制度所达到的顶点同时既变成了它的发展的最高点，也变成了限制线。甚至通过那些评定已取得的成就的统计数字也已经看得见事情的内幕。长期衰落趋势的首批征兆出现了。从1959年起，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降低。经济和社会已失去“堵塞非常重要的漏洞”和实行“动员”的迫切需要，也就无法找到要使局势正常化的根据。

尽管国内的生活指数有所改善，但资金的主要部分依旧集中用在军工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因此，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能像战后时期因美国经济战略的实现而在西方国家里所发生的

情况那样成为发展的动因。尽管水利灌溉发展得很快,并用广种薄收的方法开发了一些新土地,但被迫生存于不良“气候”环境中的薄弱的农业仍旧没有改正自己的缺点。50年代的农产品年平均净增长速度是4.8%,60年代只有3%,尽管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继续在下降。对有关指数进行比较分析时,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变得很明显了。

死亡率的增长成了又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俄罗斯在这一指数上一直都高于西欧国家,而平均寿命却一贯低于欧洲的水平。此外,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死亡率指数的差距在1910—1960年这一段时期里开始缩小。可是从1965年起这一趋势就改变了。

此外,在选择进一步发展的方案和可行途径的那个关键性10年里出现了苏联社会的基因储备的损耗问题,这些损耗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点相关联。俄罗斯从20世纪初开始失去“自己的优秀子女”——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国内战争、肃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根据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的理论来说,平均不大于10%的每一代人的代表能够把自己的理想看得高于日常生活的需求。社会的这一支“先进队伍”,即社会的最积极的代表,都是既高尚又忠诚的人,经常会遭到被事件的无情磨盘所毁灭的最大风险,或者用克格勃的一位著名分析家的话来说,他们是那种在战争时期会首先从战壕里奋起迎击敌人、在和平时期会首先反抗暴政的人。醉心于思考这些损耗的后果大概是毫无意义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影响了国家的生命力和脉搏。

与此同时,不诉诸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价值观,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处在这一巅峰时期的苏联国内的局势,因为这些价值观并不是苏维埃制度的“躯体”,而是它的“灵魂”。苏维埃的思想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信仰的客体。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原理和理论都被千方百计地保

护起来而免遭批评和检验。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与事实有联系的、服从于预测的社会发展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许下的诺言落到了一个竭力追求工业化的农业社会的沃土上,该社会的特点是流动性很大,它经历过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巨大变化。这些诺言总是有精确的兑现期限,而得到的结果则会按一系列具体的指数与其他竞争国家所取得的结果相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里因受到制度的保护而避开了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但这并不能防止那些使它的原始激情力量贬值、耗尽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实际得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作用。因此,居民的信息灵通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逐渐正常化正在名为“苏联”的这座被围困的城堡的城墙上打开缺口,动摇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人们在观察外面的世界,在比较,在思考……70年代,关于苏联的成就大得会使全人类有朝一日承认它们和效法苏联之榜样的那些官方声明(苏联国徽上以地球为背景的镰刀和锤子也表达着这一层意思)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魅力。

有征兆表明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它们预告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在维持原先方针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但这些征兆没有被人注意到。20世纪末的结构危机已经逼近了,它明确地指出有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出现了,这种途径是以利用信息和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并且是先要有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的新方法。寻找方法去克服已形成的局面的时刻即将来临,这一局面的特点是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的制造、对经济工作的纵向等级制管理、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强硬的调控、消费需求和生活水平的增长。改变应当促进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还要大大地增加对诸如电子学、信息学等这种有着横向分散管理形式的经济学新部门的投资。这些措施应该在金融物流能够自由越过国界的全球化(生产、投资、钱财流通和新事物的引